

『中国现代文学与传统文化』研究书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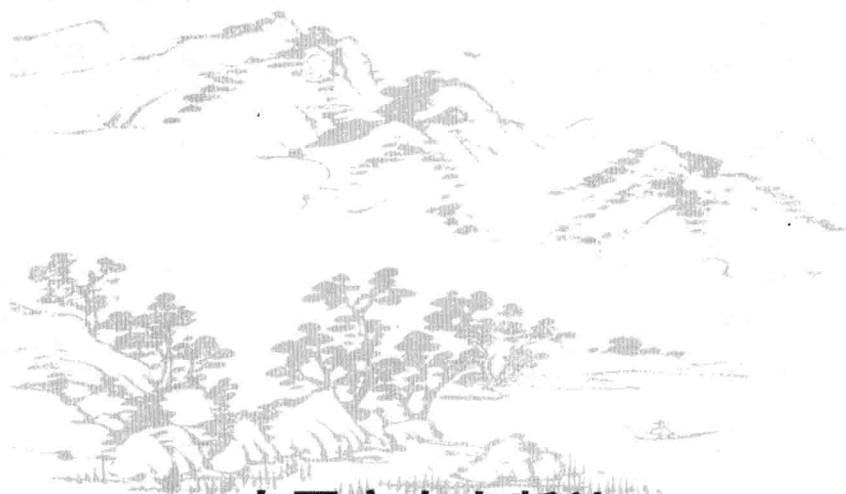
文学批评：文化视界与时空拓展

梅新林 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文学批评：文化视界与时空拓展

梅新林 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学批评：文化视界与时空拓展/梅新林著. —北京：中国
文史出版社，2007.8

（中国现代文学与传统文化研究书系，第2辑/王嘉良 高 玉 主编）
ISBN 978-7-5034-2005-4

I. 文… II. 梅… III. 文学评论—研究—中国 IV. I2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03060 号

责任编辑：张蕊燕

封面设计：卢心东

出版发行：中国文史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100811

印 刷：金东彩印厂

邮编：321035

装 订：金东彩印厂

邮编：321035

经 销：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开 本：960×640 1/16

印 张：13 字数：200 千字

印 数：1000 册

版 次：2007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200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全套定价：146.00 元

文史版图书如有印、装错误，工厂负责退换。

书系编辑例言

一、浙江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为浙江省高校重点学科，也是全省现当代文学学科中唯一的一个省级重点学科。2005年10月，浙江省在原有100个省级重点学科(A类)中选择10个文科学科作为“重中之重”建设成10个浙江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以浙江师大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为基础组建的“中国现代文学与传统文化”研究基地经申报入选。嗣后，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部门又组建一批全省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浙江师范大学的“江南文化研究中心”经申报被批准为省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本学科是该基地的一个重要研究方向。研究基地的设置，进一步整合了研究力量，旨在加大科研力度，以期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整体性研究上取得突破性进展，协力完成重大科研项目，为促进学术研究的繁荣与发展，为推动浙江文化大省的建设，作出应有的贡献。“中国现代文学与传统文化”研究书系是基地成立后出版的第一批系列研究成果，既以展示本基地和学科成员近年来的学术研究成果，同时也以此促进同行间的学术交流，使基地在日后的建设中取得长足进展。

二、本书系所选各本著作，均为本基地成员的论文结集。文

集入选原则,一是入选者要有较丰富的学术成果支撑,使入选文集体现较高学术水平;二是书系各集涵盖基地和学科的各个研究方向,以全面反映本基地和学科的整体学术水平。各文集选文,都有一个相对集中的命题,并冠以恰当书名。所选文章以近期发表的论文为重,尽可能收入高层次学术刊物发表的论文,文末注明论文发表的刊物名称及被转载的重要刊物(如《新华文摘》、《高校文科学报文摘》、人大复印资料等)名称。每本论文集字数约30万字左右,对论文作适当归类编排,每种类型设计一个小标题,在目录和文集中显示。

三、本书系暂编为一、二辑出版,每辑基本按学科成员的不同研究方向编排。人文社科基地在“中国现代文学与传统文化”总体研究范围内设有五个研究方向:两浙文学与文化研究、文学思潮与文学批评、儿童文学研究、传记文学研究、中国文学的今古承传演变研究。书系的第一辑为前两个研究方向的论著,第二辑则为后三个研究方向论著。

四、出版“中国现代文学与传统文化”研究书系,是展示、检阅研究基地学术研究的重要方式,在基地建设期间,这套书系将继续陆续出版,并使其日臻完善。今后出版的论著,将以学术专著为重,酌收适当有分量的学术论文集。

浙江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现代文学与传统文化”研究)

浙江省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江南文化研究中心)

目 录

第一编 古今演变:时间之维的延展

“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学科范式的探索与建构/3

从一个新的视角重述中国文学史

——中国文学流派研究刍议/7

中国神话的仙话化及其对文学的影响/16

文化启蒙与文学变革的双重使命

——近代旅外游记与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26

“红楼遗产”与二十一世纪中国小说/46

当代传记文学创作的反思与超越/50

第二编 文学地理:空间之维的拓进

中国文学地理学:理论创新与体系建构/57

贯通中国文学版图的四大动脉/66

陪都文学精神的形成与演变/69

从“原欲”到“情本”:晚明至清中叶江南文学的一个研究视角/88

江南市镇文学论纲/100

由“游”而“记”的审美熔铸

——中国游记文学发生论/116

游记文体之辨/126

第三编 经典回眸：百年研究的启思

《三国演义》研究的百年回顾及前瞻/141

《金瓶梅》研究百年回顾/158

《西游记》百年研究：回视与超越/174

世纪之交红学研究的转型与前瞻/187

让历史启思未来

——关于《红学通史》编纂的构想与思考/197

后记/207



第一编 古今演变：时间之维的延展

“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 学科范式的探索与建构

自2001年11月由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与浙江师范大学中国文学与文化研究所联合举办首届“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学术研讨会以来,至今已历三届。期间,又有复旦大学古籍研究所与《文学评论》加盟。三次会议相继由复旦大学与浙江师范大学承办,逐渐得到了海内外中国古代文学、现代文学以及比较文学、文艺学、文化学等诸多学科同仁的热烈回应和高度评价,其对于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的意义:一是为来自不同学科的广大学者提供了一个崭新的学术交流与学科交融的重要平台;二是陆续推出了一系列有关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的重要成果;三是引发和促进了中国文学研究视野、理论与方法的重要变革;四是对教育、学术机构的文学学科设置与人才培养产生重要影响,其中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已经教育部批准,率先在全国独立招收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的博士研究生,由此赋予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从跨学科研究方法、理论发展为新兴交叉学科的可能性前景。

然而,在历经三次学术会议之后,已有不少学者逐步从具体的研究实践走向对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本身诸多问题的理论反思与总结,其中最为关键也最为迫切的是有关学科范式的探索与建构。有鉴于此,本文拟从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的学科生成与内在逻辑出发,提出“古代—现代”、“西方—本土”、“文学—文化”的“三重维度”说,以此作为探索与建构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学科范式的学理基础与逻辑构架。

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是力图贯通和融合中国古代文学与现代文学

两大学科的跨学科研究,最初导源于上世纪末声势浩大的“重写文学史”讨论,然后由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章培恒先生率先导引、定位并取名为“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从关键词构成分析,“中国文学”标示其核心对象与内容,“古今演变”则标示其时间跨度与内在关系,因此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的第一重维度,即是历时性的“古代—现代”的时间维度。长期以来,中国文学研究被人为地分列为古代文学与现代文学两个学科,固然在一定时期适应了学科发展本身的动力需求,在推动两大学科的独立建设、研究与人才培养等方面也曾发挥了历史性作用,但也因此为中国文学的整体研究带来了严重的伤害。治中国古代文学者不了解现代文学,也就意味着不知古代文学流向何方;治中国现代文学者不了解古代文学,也就意味着不知现代文学来自何方。如此必然导致学术研究与人才培养的巨大缺陷。因此之故,贯通与融合中国古代、现代文学两大学科,而开辟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的另一条新的途径,的确很有必要,也很有意义,符合当今学科交融与学术创新的要求与趋势。需要特别强调指出的是,这里所说的贯通与融合中国古代文学与现代文学两大学科的跨学科研究,重心应落在“古今演变”,即从“古”观“今”或从“今”溯“古”的内在关系的研究上,并非打通了古代文学与现代文学的界限或者以整个中国文学为研究对象,就算是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所以,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不能简单等同于中国文学史研究。

而在方法论上,可以从三个层面入手:一是站在古代文学本位立场的从“古”观“今”;二是站在现代文学本位立场的以“今”溯“古”;三是站在“近代文学”本位立场的“古”“今”连通。但其最高境界应是超越以上三个本位立场的古今通观。就此而论,以往有些论文仍局限于古代文学、现代文学或近代文学本身论中国文学的古今演变,实不符合跨学科研究的基本规范。

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既在时间维度上表现为历时性的“古代—现代”的贯通,同时又在空间维度上表现为共时性的“西方—本土”的交融。从中国现代文学诞生历程来看,其中有双重渊源:一是中国文学由“古”而“今”的演变,二是西方文学以“外”而“内”的输入。两大主线的汇合、碰撞、交融,从不同方向共同推进中国古代文学的从传统走向现代、从本土走向世界,从而完成了中国古代文学的现代转型历程。因此,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的展开,不仅仅要打破中国古代与现代文学研究的壁垒,而且还要

打破中国文学与西方文学研究的壁垒。否则,就难以准确了解和把握中国古代文学转型历程中来自西方的另一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源,及其融于中国文学血液之中、共同催生现代新文学的方向与路径,因而也就不可能真正了解和把握中国古代文学与现代文学之间的精神蜕变。同样,西方文学与本土文学(此即指中国现代文学)也分属于不同学科,且关联度远比古代文学与现代文学为低,加以贯通和融合的难度也更大。鉴此,需要充分借鉴和吸取比较文学的研究成果。相对而言,在比较文学通行的平行、渊源、影响与交叉研究取向中,渊源与影响研究更具理论借鉴与方法移用的价值。但同样应该强调的是,比较文学的理论借鉴与方法移用只有被统一纳入并具体融合于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彼此才由分而合,才有益于后者学科范式的探索与建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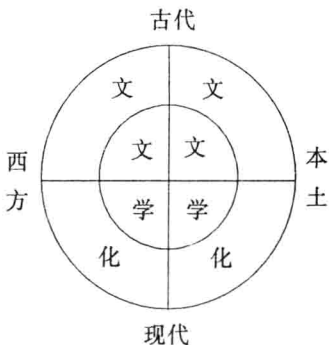
在研究方法上,“西方—本土”第二重维度的贯通也可以从以下三个层面入手:一是以现代文学为本位的以“中”溯“西”;接近于比较文学的渊源研究;二是以西方文学为本位的以“西”观“中”,接近于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三是基于平行视点的中西互观,接近于比较文学的平行研究。但其最高境界应是超越以上三个本位立场并与古今通观相交融的中西通观。就此而论,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既需借鉴于比较文学研究,但彼此有分有合,不能简单等同。

贯通于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的第三重维度是“文学—文化”的交叉维度,这是基于“古代—现代”的历时性维度、“西方—本土”的共时性维度并与其相互交融的延展性维度。文学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诞生于文化之母体,流淌着文化之血液,有什么样的文化精神,就会有什么样的文学形态,彼此连为一体,不可分割。所以,无论是时间维度上的古今贯通,还是空间维度上的中西交融,都离不开文学与文化的关系。假如仅仅局限于中国古代与现代的纯文学范围,而忽视对传统文化渊源的追溯,那就无法把握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的精神实质;同样,仅仅局限于现代本土与西方的纯文学范围,而忽视对西方文化输入的辨析,显然也无法把握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的精神实质。所不同者,文学与文化,彼此是种属关系,而非对等关系。因此“文学—文化”的第三重维度既不同于古今贯通,也不同于中西交融,而是文化包容文学,文学蕴涵文化。而从学科设置现状来看,不仅文学与文化分属于不同学科,而且因为文化的综合性、交叉性而具有泛学科性质,所以在学科范式的探索与建构上难度更大,但同时也具有更广泛的前

景。

在方法论上,“文学—文化”的第三重维度的拓展可以从以下两个层面入手:一是站在文学的本位立场,由文学演绎文化;二是站在文化的本位立场,由文化审视文学,两者都属于交叉研究,其最高境界或者最高价值是文学与文化精神脉络的寻绎、复原与重释。

以上“古代—现代”、“西方—本土”、“文学—文化”三重维度的有机构成,归根到底是由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本身的跨学科研究性质所决定的,即不仅需要贯通和融合中国古代与现代文学两大学科,同时还需要贯通和融合西方与本土文学、文学与文化等多种学科。至其组合方式与内在结构,则大致可以下图表示之:



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学科范式建构示意图

图中由“古代—现代”的时间维度构成历时性的纵轴线,“西方—本土”的空间维度构成共时性的横轴线,彼此纵横交叉,成为支撑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学科大厦的两大主轴,其中代表时间维度的“古代—现代”的纵轴线居于核心地位,代表空间维度的“西方—本土”的横轴线则居于次要地位。然后以此纵横两大主轴为坐标,通过“文学—文化”的交叉维度由文学延展于文化——我认为,此即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学科范式得以建构的学理基础与逻辑构架,具有从理论延伸到方法论的综合性、开放性与创新性意义。

原载《河北学刊》2006年第5期。

从一个新的视角重述 中国文学史

——中国文学流派研究刍议

如果说文学史流程是一条线，文学大家是依次排列在这条线上的闪闪发光的点，那么，以文学大家为核心、以文学家群体为依托的文学流派，便是进而将这些闪闪发光的点组合成美丽光环的圈。圈的形成、移位、变形、兴替……既有其外显的演化轨迹，又有其内隐的衍变规律。只有当文学从宗教、礼仪、哲学、政治合为一体的混沌世界中分离出来走向自觉与独立时，才会出现富有鲜明个性的文学家以及由文学家群体组合而成的文学流派圈；同样，只有当文学随社会的发展而发展日趋繁荣时，各文学流派圈才会此呼彼应，互竞风流，或开一代文学之先声，或领一代文学之风骚。由此可见，文学流派是文学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走向自觉与独立的产物，也是文学走向兴盛和繁荣的重要标志。文学史，从一定意义上说也就是文学流派圈的发生与兴替史。文学流派基于内部、外部原因的不断演变，各文学流派之间的相互争鸣与交融，不同时代不同文学流派的借鉴承传与批评阐释，作为文学流派领袖之于一代文学的影响等等，都是左右文学史发展的重要因素，也是文学史研究中的核心课题。因此，文学流派史的研究，既可以进一步夯实文学史研究的根基，也可以从另一个视角重述新的文学史。

文学流派，是一个并非没有争议的概念，无论其内涵还是外延都有相

当大的伸缩性。《辞海》的释义是：“在一定历史时期里，文学见解和风格近似的作家自觉或不自觉的结合。”《中国大百科全书》则释之为：“文学发展过程中，一定历史时期内出现的一批作家，由于审美观点一致和创作风格类似，自觉或不自觉形成的文学集团和派别，通常是有一定数量和代表人物的作家群。”然而，当我们面对各种不同文学流派的具体表现形态时，就会感到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在有关“中国文学流派”的辞书条目中，也曾将“孔孟”、“老庄”、“汉赋”、“志怪小说”、“志人小说”、“传奇”等列为文学流派，与我们平常所说的文学流派概念相去甚远。为了澄清文学流派概念和术语使用上的混乱，我认为有必要对文学流派确定一个“量化”标准，这个“量化标准”根据从不自觉到自觉、从雏型到完型、从古典形态到现代形态可排列如下：

(1)有一定数量，在创作上有共同追求并已形成鲜明风格的代表作家的群体结合；

(2)有对本流派的创作进行较为系统的文学批评或理论总结；

(3)有明确的文学理论主张和共同的文学纲领，并与观点不同的其他流派展开论争；

(4)有一定的社团组织形式，且有持续或定期的群体文学活动；

(5)有连续发表创作、批评、理论成果的阵地。

在以上五条标准中，拥有的条件越多，文学流派的完型程度越高；反之，则完型程度越低。其中第一条是每一个文学流派所必须具备的基本条件，通过这一条标准，既可以排除个体作家的个体创作行为，又可以排除属于文学范畴之外的如“孔孟”、“老庄”等非文学流派属性，即便如《论语·先进》：“文学子游、子夏”所称的“游夏”，也不应该称之为文学流派，因为这里的“文学”意为“文献”，与我们今天所谓的“文学”有别。第二条标准从创作提升至文学批评和理论总结，标志着一个文学流派的逐步走向成熟。第三条标准则在理论上表现出更高的自觉程度，在流派形态上也更趋完善，是一个文学流派真正走向成熟的体现。第四条标准的标志性意义与第三条大致相同，但在组织上有了更为严密、更为有序的保证。第五条标准为近代以后的文学流派所普遍具有，因而成为文学流派从古典形态走向现代形态的重要标志。

由于不同时代各文学流派具有不同的发育程度和表现形态，因而当我们在使用文学流派这一概念检测具体对象时，一定要首先准确把握以

上五条标准的必备条件及其依次递进性,同时也可以由此准确地把握文学流派与文学社团、运动、思潮、风格、题材以及作家并称等的分合关系。文学流派并不都有文学社团组织,早期的文学流派尤其如此。反之,文学社团虽然在“有一定的社团组织形式”这一点上合乎文学流派的第四条标准,但并非所有的文学社团都是文学流派,现代文学史上有的文学社团组织从诞生到消亡只有二、三年,有的甚至更短,只有几个月,既没有成“流”,也没有成“派”,没有什么创作实绩,更谈不上形成自己鲜明的独特风格,连文学流派的第一条必备条件都不具备,因此不能称为文学流派。可见文学流派与文学社团是交叉关系而非对等关系,只有合乎文学流派必备条件的文学社团才同时又是文学流派。文学运动与文学思潮的情况也与此相类似。文学运动是指发生在文学界中有组织、有领导、有纲领的群体性行为,虽然它合乎以上文学流派五条标准中的第三条标准,但它往往是一种社会性的、思想性的、理论性的群体运动,一般都超越于具体的文学流派之上,如唐宋的古文运动,近代的“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现代的“五四”新文学运动,等等。在文学运动中也能产生文学流派,如唐代古文运动中的韩柳古文派,“五四”新文学运动中的文学研究会、创造社等。但文学运动有时仅限于文学运动本身,或者直接衍为政治运动,而没有产生文学流派,如五、六十年代的批判胡风、批判《海瑞罢官》运动,都没有产生相应的文学流派。文学思潮是指“一定历史时期和一定地域内形成的,与社会经济变革和人们的精神需求相适应的,具有广泛影响的文学思想和文学创作潮流。”^①与文学流派比较接近,但相比之下,文学思潮要比文学流派更为松散,可能由某一文学流派主导一种文学思潮;也有可能由几个文学流派同时体现了相近的文学思潮;或者只有文学思潮而未能形成文学流派。因此,文学思潮与文学运动一样,与文学流派也都是交叉关系的非对等关系,只有合乎以上文学流派标准的文学运动、文学思潮才同时又是文学流派。

此外,文学流派与创作风格、题材以及作家并称也有密切的关系。婉约派、豪放派即是以风格称派;山水诗派、边塞诗派则是以题材称派;至于作家并称诸如李杜、苏黄者更是代代有之,判断其是否同时又是文学流派,也同样必须以以上文学流派标准衡量并取舍之。

^① 《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

根据以上五条标准，我们便可由此进入对中国文学流派发展演变历程的时期划分。

(一)萌发期(先秦两汉):文学流派的渊源与文学本身的渊源一样古老,最初可以追溯至上古时代不同区域不同氏族集团“集体创作”的神话传统。但以第一条标准衡量,中国文学从先秦到两汉无疑都处在“前”文学流派时期,即文学流派的萌发时期。当然,其中的进化之迹也是十分明显的,从上古神话到《诗经》,区域性的“个性化”色彩越来越明显,“十五国风”即代表了十五个不同区域的诗歌风格。然而,文学流派首先是富有个性的文人作家的群体组合,而在仍停留于“集体”创作的“诗经”时代,显然不可能出现文学流派,只不过其中已多少具有后代区域性文学流派的一些因素罢了。下及春秋战国时代,诸子百家争鸣局面的形成,在“派别性”这一点上无疑前进了一大步,已与后代的文学流派颇为接近,而且在当时文史哲混而不分的情况下,诸子多兼哲学家与文学家于一身,如孔子、孟子、庄子等,但他们首先是论道而不是作文,首先是学术派别而不是文学派别,因而仍未具备文学流派的必备条件。

原始神话、诗经是有文而未成派,诸子是有派而非文,至战国末期以屈宋为代表的楚辞作家群的崛起,显然在以上两个方面都已进一步向文学流派接近,已具雏型文学流派之特质。尽管屈原、宋玉以及唐勒、景差等都是宫廷文臣,尚未具备独立、自觉的文人创作意识,也不同于后代文学流派的作家群体组合,但比之神话、诗经、诸子,无论在创作的群体性还是特色性上都已与后代的文学流派较为接近,并由他们的文学创作直接发展为汉代一代文学之主流——汉赋,因而可以称之为“准”文学流派,或者说是雏型的文学流派。

(二)形成期(魏晋至盛唐):魏晋是中国文学走向自觉与独立的时代,也是中国文学流派正式形成的重要时期。汉末建安年间,以“三曹”为核心,以“建安七子”为主干的建安文人集团的出现,即是中国文学流派正式形成的标志,因感于董卓之乱的历史浩劫,这一文人集团在创作上普遍具有一种“雅好慷慨”、“志深而笔长”、“梗概而多气”的独特风格,后人称之